

未来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汪晖会议发言（录音整理）

从今天上午温铁军教授的发言、萨米尔·阿明教授的发言、包括刚才大家的发言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图景，是非常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都在寻找这个可能性，怎么去改变？所以我选的题目是“未来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般讨论未来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个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未来。讨论未来常常总是压抑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脚下的、在我们的行动里的。我就想从这个话题开始做一个引言。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位德国的学者，他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你做一个回答，什么是中国的未来？用一个象征性的、物质性的存在代表什么是中国的未来？他原来是阿多诺的学生，所以我知道他背后的问题，有一点像本杰明所讨论的巴黎，好像从十九世纪里面伸展到二十世纪里面来的，哪怕是在纳粹占领之下也必须和这个存在相一致，它代表着一种未来的考量、但是是从过去里面来的。

我就想到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中，我们今天的讨论“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中乡村在中国的比喻——我在讨论中国的未来的时候，想到二十世纪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毛泽东的例子、一个是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他们所代表的乡村建设的这两个例子，我把他们作为从二十世纪伸向未来的可能性的象征。在1929-1930年，也就是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以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也是中国革命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的时期，毛泽东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一个是“星星之火能够燎原”、一个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都是讲革命的。在革命的讨论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毛泽东在寻找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他是怎么寻找的呢？当时中国都是白色恐怖，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心地区的武汉、上海这些地区很强，在中心地区找不到这个可能性。所以他说，在边区、在落后省份交界的地方，存在着可能性，他把那里叫做“薄弱环节”。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以上的人都知道这个“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代表着未来。看起来是最落后、最没有希望的地方，代表着未来的可能性。二十世纪的历史是在最大的失败和危机的情势下，寻找到这个可能性、这个“薄弱环节”的时候，革命历史发生了一次很重要的转折。

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两个例子是互相参照的。因为梁漱溟先生也好、卢作孚先生也好、还有晏阳初先生、还有中国革命所讨论的乡村问题，事实上都代表了二十世纪很多可能性的基础。今天早上，温铁军教授在讨论到中国的某一种特殊性的时候，特别提到中国的土地、中国土地制度的形成，通过中国革命形成的相对平等的土地制度是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太一样的。由于这个土地制度和一场广阔的社会动员联合在一起，尽管当中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值得反思，但是这个土地制度的形成是通过自主的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运动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社会的自主性的体现。它在基础上面是带有社会制度性的自主性的。这和东亚有一些国家，比如日本，在战后

由于美国的占领、或者依附于当时的帝国主义体制所产生的土地再分配，是不一样的。中国是在大规模的农村运动、农业社会中所产生出来的可能性。

因此，要讨论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曾经产生过的、今天我们现在还正在部分享受着的遗产，它已经面临严重挑战。我们可以称之为自主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跟土地的问题、乡村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构造的自主性，如果依附性越来越高，比如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我们的发展模式大规模的依赖国际市场、我们必须依靠农业但又没有能力进行持续的保障，自主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是和其他社会体制发生危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的伟大传统被丢失了。而这种丢失就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危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确实需要讨论的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阿明教授提出的，重新定义什么叫“兴起”的问题；第二个我觉得是温铁军教授一开始也提到的“主权外部性”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着独立自主的传统。但是随着基本社会体制发生转变之后，外部性的要素也渗透到自己的体系当中，这使得重新定义“兴起”在中国今天的语境里面变得尤其的急迫。我们在总结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遗产时，反思批评非常多，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抛掉”一样否定二十世纪的历史传统。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在我过去的文章里也提到过，讨论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基本前提，至少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一个政治前提是上午讨论过的，在二十世纪形成的比较独立自主的国家性格，以及和这个国家性格相应的相对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历史遗产中的问题需要改革，但是改革的前提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第二，这个“独立自主”不仅仅是我们一般说的“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漫长的政治过程的产物。它不是一般民族国家主权意义上的“主权”，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进展的产物，是一个社会运动的产物。其中，这个社会进步是特别重要的。在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以来，最重要的社会进步，也就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独特性，就是这场社会运动是通过农民和农村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改造来完成的。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世纪的前期，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非常少，中国绝大部分基本上是农业的农民的社会。所以，在这场斗争当中，无论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社会转变，主要是通过农村社会的社会转变而来的。正是因为这样的一场运动是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发生的，同时它又带有追求社会主义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里面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就其社会政治条件而言，要求超越自身社会阶层的利益来追求公共的普遍性利益。对农村社会而言，当时的创造一方面是要分得土地，获得农民自身的利益；同时，这个阶级解放的过程是包含了创建新社会的过程，创建新社会的过程中还包含了一个自我否定，这是农民的农业社会里面、当年的社会政治里面的超越性。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这场社会动员是通过“乡村和城市”、“革命政党/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广泛结合才能产生的。这个结合，我们用一个二十世纪的术语——“阶级”这个概念。今天这个概念我们已经陌生了、不会去讨论。当这些知识

分子、精英阶层跑到农村去、跑到延安去、跑到邹平跑到定县、别的地方去。当他们这样和农民一起工作的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下乡”的过程，而是转化自己的主体性，把自己融入到社会里面，不是让自己等同于农民、而是共同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体性。一个新的社会主体性在这个交融当中重新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术语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阶级的背叛”，背叛自己的本阶级而去和另外一个阶级结合，不是简单的变成那个阶级、而是产生一个新的政治主体性。这样的一个政治的社会条件，在今天大规模的小时。在今天的当代中国社会里面，只是存在着一些痕迹、存在着一些人的努力。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许多的志愿者、合作社的实验，从事乡村建设、环境保护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历史遗产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某种延续。

就大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个事情需要阐发、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在当代的条件下，不是简单的可以回到二十世纪的政治遗产里面去。我们讲二十世纪，不等同于要恢复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了解这样一个运动，这些实践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今天我们一天的讨论里面，我自己已经学到很多，有关全球化、金融、粮食、土地、水……所有这些领域普遍存在危机的状态。就政治方面来说，当代全球化、垄断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层面所造成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曾经用一个术语来概括它，这个术语叫做“代表性的断裂”或者“代表性的衰落”（The crack of representation），它背后所表示的就是政治的体制、政治的构造和一般的社会关系、社会形式之间产生着巨大的断裂。这样的体制并不是发生在单一的社会中，每一个社会中政治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分离都不是一种社会形式之中产生的。我们看西方，在美国、在欧洲，以及在中国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条件之下，也都出现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之间巨大的脱节。包括那些已经看到的垄断性的、寡头性的要素的浮现。在中国，曾经高度流动的社会中，现在的底层社会却很难有渠道流向另一个阶层，这样的社会流动性大规模的衰落。也就是说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脱节是中国社会和许多社会在今天的许多危机的中心环节。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认为有几个基本的层次、要素，我曾经用一个顺口溜一样的说法来说明这个危机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把它叫做政党的国家化。“政党”在二十世纪曾经是连接着社会和国家的一个政治性的运动，它代表的不单是价值，而且它通过这个运动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代表着自主性的社会，形成由下而上贯通社会流动的体系。但是今天我们的政党，就其规模而言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么规模庞大的政治组织。但是，这样的政治组织的政治性质却在不断的衰落，它逐渐的退化成为一种国家机制。一方面可以看到政党好像是掌握着很多的权力，但是它运作的方式却越来越遵循一般的国家的逻辑。这使得这个社会中的政治的动力出现了问题，至少在中国是这个状况。

第二个方面，由于国家的这个政治逻辑而发生了很重要的转变——国家越来越接近于公司化的运行，我们把它叫做“政府的公司化”。我们经常在公共政策，

甚至很高层的政策咨询中也经常看到，一个文件中经常出现自我矛盾的表述。为什么会自我矛盾呢？因为它代表不同的利益，都需要在这个文件当中得到表达，甚至相互矛盾的意志都会在同个文件中获得表达。这意味着它盘根错节的和今天的市场经济里面的社会关系纠缠在一起。

第三个方面，是所谓“媒体的政党化”。今天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大，媒体经常表述出一些政治的意向、提出政治的议题，但是事实上媒体的这些政治议题不能够代表一般社会的真正的运动。以乡村建设做一个例子，这些实践在我们的媒体中能够呈现的只是非常非常少的一点点。绝大部分的话题都被另外一些力量所设置，当政治力量发生了危机、原来的政党不能够清晰的提出未来目标的时候，似乎是由媒体在不断的设置新的议题。但是这些媒体同样被各种利益所操纵，所以它不断地流动，极大的鼓励了政治上的投机和虚无。这是今天很清楚的一个现象。

第四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今天由于金融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劳动分工在这个条件下发生的变化，我们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悖论式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开始了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今天中国的工人已经将近三亿，绝大部分这些工人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称之为“农民工”的这些新工人。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阶级制造过程。我们知道虽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这样的大规模的阶级重构的过程当中，原有的二十世纪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同时在大规模的衰落。并不是不存在，而是转化了，不能再向过去一样发生动态的运动。当然，可以在理论上去思考什么是阶级、怎样去理解阶级政治这些问题。但是就我们最肤浅的观察，我们以工人的斗争来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举出三种不同形式的斗争模式。其中的两种模式是大家常常讨论到的。一种，在媒体中谈的比较多的，是法律维权。就是说依据《劳动合同法》等这些法律来保护工人的这些权益。它基本上建立在今天的法律的基础上，它的重心在于维护工人个人的权益。这是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努力，有很多的 NGO、律师在做这样的事情。但这种运动大部分情况下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劳保待遇的谈判和保障方面。第二种更具有政治性一些，是围绕着工会的运动。比如像 HONDA（本田）汽车的罢工，慢慢产生出相对独立的工会。在一些跨国企业当中，也逐渐产生出这样的工人运动。这些运动的产生，事实上与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里面由于有公有制，所以工会的角色和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工会角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欧洲的社会运动、包括当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工会运动是远远早于一般的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里面，恰恰是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说社会主义运动带动着工会的运动。后来的政治性的运动并不是从一般的工会运动当中发展出来的。所以社会主义体制确定之后，工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说服、教育、帮助、一定程度的保护的角色。所以，他和公有制条件下的国家是连体的。当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之后，原有的体制就不再能代表工人、也不能保护工人了。所以，工人的政治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有一个政治的发展，需要有更加自主的

组织的发展。但是，所有这些运动我们虽然不断可以看到，但我们也看到它们的能量有限，在今天它不是一个能在宏观上改变整个方向的运动。第三种斗争的形式常常是被忽略的，但是影响是巨大的，它在报纸新闻中经常不是作为运动、斗争来表述的。它是这样的，比如说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很多工厂、大型的跨国企业都纷纷从沿海到了内地——这些劳动力更加密集、也比沿海更加廉价的地区，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所谓维系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但是最近出现的现象非常有意思，就是即便是在这些所谓劳动力剩余的地区、人口密集的地区，也出现了劳工短缺的现象。我们过去说沿海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而现在在内地也常常会出现劳工短缺的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所谓“打工短期化”的现象，就是说很多工人不愿意在工厂呆很长时间，他们待一年两年甚至半年就离开了，所以造成了工厂在雇佣方面的困难。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河南富士康招收工人的时候，当地政府需要每招一个工人补贴两百元，说明招工是个很重要的压力。这个压力是从哪来的？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而且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斗争的形式。

因为这就讨论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可持续的实践和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当代城市社会当中，劳动者地位的变迁必须和乡村建设的问题连接起来才有可能改善城市劳动者的位置。这是逼迫资本作出妥协。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第二个我们值得注意的具体的斗争形势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自己去过一些地方，也观察过一些地方，我觉得很有趣，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所谓“打工短期化”发生的时候，很多农民干了一两年就离开了工厂到别的地方，或者去寻找别的工作或者回到自己家乡的某一个地方去寻找工作，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是有损失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劳动合同法》来保护他们工作的权益，因为他们提前离开所以没办法签署资方要求的干五年的劳动合同，他们提前离开了就得不到真正的劳动补偿。在这个得不到劳动补偿的状态下，尤其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包括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出现的状况是什么呢？比如有些地区的劳工的组织是利用原来乡村里面社区的联系，在城市当中进行斗争。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正面有负面，比如说出现了领工制的现象，也就是出现了一些中间人，这些人都是家乡的，每年带着一些工人到城里来和公司签约，工人离开的时候就由这些中间人代表工人去和资方谈判，能够讨回一点点的利益。这个过程当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一方面这个过程当中有双重剥削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要保存的是什么呢？是值得注意的。我们都知道富士康工厂里面自杀的事件，今天的生产使得人完全的异化疏离，使得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形成社会关系。领工制这样的社会网络，实际上是在城市化的条件下他们重建自己社会关系的一种努力，就是说，他们试图把原来在乡村当中带来的社会联系变成自己在城市的生活中重建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我看到的一个新的连接点。使得城市工人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和乡村社会的建设和斗争重新关联起来的一个运动。这也使得我们重新理解二十世纪的另外一个政治遗产，就是城市和乡村关系的重构。工人和农

民之间的新的联系，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我们的未来。
谢谢！